

学术文化

刘开述略

龚书铎

〔摘要〕本文以桐城派弟子刘开为题，主要介绍了刘开的出身、交友、人品和才华，论述了刘开在学术方面尤其在程朱理学上的独到见解，着重介绍了他在文、诗方面的才华与成就。

〔关键词〕刘开 桐城派 学术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1)03-0067-05

Research on Liu Kai

The career of Liu Kai, a student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is the subject of this essay. The article introduces his family background, social relationships, personal character, and special talents. It also discusses his unique views on scholarship, in particular Neo-Confucian thought as well as his achievements in prose and poetry.

一

刘开，字明东，一字孟涂，又字方来，安徽桐城人，生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幼年丧父，家贫寒，赖其母吴氏艰苦抚养。他从小好学，“吴理庵（士黼）先生授经里中，先生贫不能从游，且甚幼，日于学舍外窃听讲论。理庵先生异之，询知其为孤儿也，召至家授读。”^①14岁时，上书桐城文派大家姚鼐，得到姚鼐的赏识，“因从事先生之门，得其学”^②。于是刘开成为姚门高第弟子，姚鼐在《惜抱先生与管异之书跋》一文中说，他与梅曾亮、方东树、管同称“姚门四杰”^③（一说“四杰”中无刘开，为姚莹）。

清代，桐城巨族名门颇多，文风也盛。刘开为人“落脱不羁，喜交游”，20多岁时先后结识了光聪谐、张聪咸、左筐叔、徐六襄、姚

莹等人。“当时意气相许，以古人为期，岁过从，欢讌无间”^④。据姚莹所记，这些里中英彦，常交游于方竹吾的北园。“嘉庆十一二年间，则有李海帆、朱歌堂、方植之、马元伯、左筐叔、徐六襄、张阮林、刘孟涂、吴子方、光聿原、朱鲁存。此十数人者，皆以文章道义相取。余时年略少，每与往来，觞咏其中，以为竹林之游，无以过也。”他们在这里吟咏的诗，其后编为《北园讌集诗》，姚莹为之作序。嘉庆十三年（1808）后，“乃各散之四方，虽间岁颇有会者，卒寥落矣”^⑤。留给刘开的，只是对当年的美好回忆和怀念：“昔者吾党之人才尝盛，以吾与栗原、筐叔、石甫诸君之同聚乡里也。游讌之与俱，言论之与共，文章道义之相与磨砺而讲习，是岂不足以报友朋之盛乎！”^⑥

刘开家贫，“既无兄弟，独身养母，傭书四方，寒暑非惮，尚衣食，绝嗜欲，文采之外，

〔收稿日期〕2001-03-15

〔作者简介〕龚书铎（1929—），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875

无他营焉”。他曾入两广总督蒋攸幕府，“一日省城外下河火，相国闻报，曰：‘吾知其中必无孟涂。’盖下河故游士挟妓纵酒地也”。这也说明刘开“绝嗜欲”的人品。

在广州，刘开与姚莹相晤。刘开在蒋攸幕府时，适姚莹也到广州。姚莹于嘉庆十三年得中进士，但以不工小楷，未入翰林，也未任官，遂至广东游幕。故人客中相逢，使刘开大为兴奋，作《喜晤石甫》诗，以表达其心情。在桐城朋辈中，刘开和姚莹感情深厚，在他的诗集中，有不少诗作是怀念姚莹的。他们还结识广东著名诗人张维屏，诗酒唱和。刘开有《赠南山孝廉》诗：

展我碧瑶笺，书君白雪篇。孤花艳春色，空翠点晴烟。此笔自今古，有人来海天。相逢无限意，留记暮云边。

痛饮不知醉，新交翻易愁。行藏看一别，邂逅足千秋。立志在宵汉，高文齐斗牛。迟回江上路，却是为君留。

刘开离开广州时，张维屏作《赠刘孟涂开，即送其归桐城》诗为送行，诗中称：“刘郎下笔长河流，胸次直欲罗九州。”其后送别姚莹，张维屏作《送姚石甫进士还桐城，并寄刘孟涂秀才》诗，以表达对刘开的别后怀念。

刘开为人，直谅，“与人谈论，辄罄肺腑，言不少隐”^⑩。他对朋友更是直言不阿。有一次姚莹有失检点，刘开知道后，在与姚莹、朱鲁岑对饮时，痛责姚莹。当时姚莹“已成进士，著书作文日有名”，不能忍受，忿然离去，但走至中途又返回。刘开更加痛责，如是三次。在座的朱鲁岑觉得刘开做得太过，刘开回答说：“所贵乎友者，为能责善劝学也。今石甫成进士，著书作文日有名，年少气盛，其行不及检，苟无友以责之，异日将肆然在上矣，学业不自此隳乎，宁石甫绝我，我不可阿石甫也，且石甫亦必不我绝也。”^⑪姚莹终于诚恳接受他的意见。可见刘开鲠直不阿的品格。但关于他是否钻名求利，有不同的评论。姚元之在《刘孟涂传》中称赞刘开“奔走四方，间无干谒之态，以故人争重之，四方贤士无不知有刘孟涂者”。然而，与刘开同为姚门“高第弟子”的管同，在《刘明东诗文集序》一文中则说，有人以为“明东学于姚先生，不务师训，而奔

走公卿形势，朝上一书以求名，暮进一诗以钻利，此战国游士苏张之流耳，岂知道者与？”这显然是说刘开四处奔走于达官贵人之门，以求名钻利。对此，姚莹有所解释：“不然，明东自负其才，欲为世用，蹶于诸生，身屯而道塞，借势王公大人，思以振厉，彼所谓不差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者也，岂游士伦哉！昌黎韩公数数千贵人，自言凡吾所为，小待将以具裘葛，养穷孤，大待将以同吾所乐于人。夫明东之志，亦若是而已矣。”管同固然认为姚莹与刘开为至友，“其必有以得其深，而非他人所能识者”，但自己并没有认同，而是说“与明东踪迹疏甚，无以定其为人”^⑫，态度客观。

作为封建社会的文人，刘开也是走科举的道路，“习举子业，试辄不利”，终生只是县学生员。道光元年，刘开应聘“亳州修邑乘”，寓于佛寺。^⑬四年闰七月十四日（1824年9月6日），“陡得腹疾，委顿势不起”^⑭，终于去世，年四十一岁。妻倪氏自缢。妾蒋氏，生一子，名继，字少涂。母孤得姚莹、光聪谐、马瑞辰等分别迎养于家。刘开生前已有诗集10卷刊行，去世后，姚莹急造其家访遗稿，获得后集22卷，缺第8卷，文集10卷，骈体文2卷。姚秉之耽心时间长了会有佚失，于是捐资刻印，由姚元之主持其事。道光六年刊刻，合为《刘孟涂集》。

二

刘开以文、诗名，于学术也颇关注。陈方海在给刘开所写的传中说，“说经之书及杂著皆未成”，可见他对儒家经书也有所研究。刘开自己说他治《论语》，撰有《论语补注》3卷，并写了“自序”。据方宗诚《刘孟涂先生墓表》所记，刘开还著有《大学正旨》2卷、《中庸本义》2卷、《孟子拾遗》2卷和《广列女传》20卷。《广列女传》稿存于张维屏处，刘继长大后取归，由方宗诚负责校勘刊刻，方撰《校广列女传》。

桐城文派多尊师程朱理学，刘开也不例外。但他对当时宋学存在的弊病并不回护，而是予以明确指出：“言宋者流为空虚固陋之

习^⑭；“治义理者则近于鄙俚，而不免语录之习^⑮”。当然，他对汉学末流批评更多，指出“言汉者溺于琐碎纷纭之说^⑯”，“详于名物度数，而或略于义理之是非。其后嗜古者益以博为能，以多为贵，而不顾理之所安。厌故而喜新，以功令所载为泛常，以先儒所言为迂阔。于是猎奇好异之习兴，而躬修心得屏而不论，因之以进取，加之以希时，纷华夺其外，利欲乱其中，而所谓学术者不可言矣^⑰”。然而，不能因此认为刘开尊宋排汉。刘开虽然尖锐批评汉学末流的弊病，但并不排斥汉学，他认为“道无不在，汉宋儒者之言，皆各有所宜，不可偏废也^⑱”。所以，他主张汉宋兼取，“取汉儒之博而去其支离，取宋贤之通而去其略^⑲”。

尊师程朱而不排斥汉学，大致是当时桐城文派共同的学术倾向。不仅刘开，管同、姚莹乃至方东树都是这种态度。在桐城文派中，批评汉学最激烈的当数方东树。尽管他在所著《汉学商兑》中不遗余力地攻击乾嘉汉学家，至于到了强词夺理、肆口诋讥的地步，但在事实上并不完全否定汉学，他也认为“训诂名物制度实为学者所不可阙之学”。桐城文派的三祖姚鼐，即主张合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为一。姚鼐对程朱理学和许郑汉学兼收并取，其门弟子当亦遵守师门规矩。不过在汉宋学之间，姚鼐是有所侧重的，并不是二者同等看待。他是以宋学为主，用汉学为宋学服务。他说：“汉人之为言，非无有善于宋而当从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粗之弗别，是则今之为学者之陋，且有胜于往者为时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说而失于隘者矣。博闻强识，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则可也，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⑳刘开的旨趣，无异于乃师，也认为宋汉学之间，有大小急缓、后先轻重之别。他说得明白：“吾所以尊师程朱者，非党宋也，为其所论者大，所持者下，切于民彝，而裨于实修，可以维持风教于不坠也。其兼取汉儒而不欲偏废者，非悦其博也，将用以参考异同，证明得失，可以羽翼圣道也。”^㉑以宋学为主，汉学为辅，这就是刘开等人的基本态度。尽管刘开标榜尊师程朱，但宋学已趋衰落，不可能回复到康熙时尊宋的局面。所以，刘开又说：“宋之

与汉，其学固有大小缓急之殊也，其交相为用一也，合之则两得，离之则两失”，而应“兼汉宋之长，而折衷于孔孟^㉒”。这也就是“折衷汉宋”、“调和汉宋”，无论汉学、宋学，都要归结于阐扬孔孟之道。调和汉宋，是嘉道年间学术趋向的一个表现，也是士风的一个变化。

刘开虽尊师程朱，崇尚义理，但他对义理有自己的见解。刘开不是只讲义理，而是把义理与人情相对待，不仅讲理，而且讲情。他批评“后儒不顾人情所安，而以义理之言束缚天下，严之以仪节，多之以防闲。于是乎有操励之学，有专敬之功，论非不是，而人莫能久从，则是言理太密之过也。”他认为“情胜理则无节，理胜情则难行。义理与人情两不相胜，则人心平而天下安”。因而，他主张“义理与人情合而为一^㉓”。刘开的“理情合一”说，应该说是突破了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是前进的。但“理情合一”落后于其乡前辈戴震的以情反理，戴震严厉谴责“后儒以理杀人”，刘开则只是调和义理与人情，人情不能越出义理的规范。

调和汉宋，是对当时面临宋学流于空虚、汉学溺于琐碎的不良学风的一种调整，希图改变无实无用的状况，而臻于通经致用。其时士习衰恶，人才日下，群奔走于利禄之场，“凡所谓经世之略可以备天下用者，皆置而不讲”，“言经既不适于用，言史又无裨于身^㉔”。刘开对此很不满意，他批评“习俗日以浮薄。天下之士，能取科第者足以为才矣，而不通治术无伤也；有多闻博辨者足以称贤矣，而立身之有亏无损也。骤而语以忠信廉节之事，则惊愕而不欲闻，询以家国天下治安之计，则茫无一得^㉕”。甚至“束发成童，即期以富贵。所尚者非通经也，应举之文也；所求者非致用也，干禄之术也。”^㉖他主张经世致用，认为“古时士习六经，凡兵农刑政之事，无不推寻致详，故内以资身心，而出可备天下国家之用。至记诵辞章之学兴，士溺文艺，不知经世之略。”他表示：“余固好言兵农刑政之事，而不甘于记诵辞章者也。”^㉗刘开怀经世志向，姚莹在文章中也曾言及。他说，刘开“负大志，区画世务，体明用达^㉘”。嘉道年间，讲求经世致用

是学风变化的新趋向。提倡经世致用的人士颇多，不独刘开，如他的挚友姚莹，“弱冠时即以经世自任”。不过，刘开虽抱经世之志，但几次应南北乡试都未考中，“踬于诸生，身屯而道塞”，怀才不遇，不免愤世而嫉俗。

三

刘开作为姚门高第弟子，以文名。他的文章既承师法，又有自己的特色。刘开主张为文在于“能夺其才力，倾其蕴蓄，出其陆离光怪，泄其悲愤幽郁，以自成一家之言”^{③①}。他不仅这样说，也是力求这样做。他说：“余抱简默之志也久矣，身遭困厄，内束于身心之累，外感于习俗之变，不得已而藉文以舒其悲愤之思。”^{③②}他对士习、学风、人才等的议论的文章，都是因时而发，“藉文以舒其悲愤之思”的。因此，他的文章言之有物，气积势盛。阳湖派的陆继辂评论说，刘文具“清刚疏朴之气”；管同称赞“其文辞飘忽而多奇”，“辩博驰骋，光气发露，不可掩遏”^{③③}；方宗诚认为刘文“天才闳肆，光气煜煜，能畅达其心之所欲言”^{③④}，都说的是刘文纵横清刚的风格。

刘开作文，主要是散文，但也作骈体文，其集中即收有骈体文2卷。清代文坛古文发达，而骈文也颇流行，作者甚多，并先后出版多种骈文选本总集。古文、骈文的关系，是当时人们关注的问题。不能否认存在着崇古文者排拒骈文的情况，但也有一些古文家主张骈文与古文“相杂选用”，即骈散融会。曾师事姚莹受古语法、阳湖文派的李兆洛，于道光元年刊行所编选的《骈体文钞》，就是体现了这一宗旨。而刘开以桐城文派而兼作骈体文，不单纯是受时风影响，或个人的喜好，也是要兼采骈文之长，融会骈散。他在《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中说：“夫文辞一术，体虽百变，道本同源……故骈之与散，并派而争流，殊途而合辙……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废。”^{③⑤}就骈文而言，刘开也有其成就。陆继辂就很喜欢刘开的骈文，他说：“桐城刘开孟涂，姬传先生古文弟子也。然其文不尽守师法，故余尤爱其俚体。尝跋其后云：‘拾其片语，皆

焦氏之奥词，检其数联，成联珠之妙制。而作者才思喷涌，用之如泥沙，非虚誉也。’”^{③⑥}在清人张寿荣所刊《后八家四六文钞》中，刘开作为一家入选，与李兆洛等并列。

刘开不仅能文，也能诗，在44卷的遗集中，诗占了32卷。他的诗作也得到其师姚莹指点，姚莹曾指出其所寄赠的五言排律存在的缺点：一是“于杜公排律，布置局格，开阖起伏，变化而整齐处，未有得也”，这是诗境大处；一是“所用故事，都不精切，止是随手填入”，这是诗律细处。姚莹认为，“二者得一，亦可谓佳，但非其至。二无一得，便是今日草头名士之诗。吾恐明东陷入其中，故须为详言之耳。”^{③⑦}这对刘开为诗当是有益的指点。

刘开身遭困厄，佣书四方，比较了解民间疾苦，具有同情心。而他的经世思想，也蕴含着民本思想，认为“民者，地气风化之所系，国是人心之所存者也”^{③⑧}。因而在他的诗篇中，有一些如实地描写了官吏腐败、百姓穷苦的。如嘉庆十六年秋，刘开在《喜雨歌》中反映了旱灾给农民带来的灾难：“禾焦土裂沙尘色，凄凉比户人无食。慈母牵儿夫别妻，仓皇走向道路啼。朝从朱门觅残粒，暮投古寺席地。苦甘今昔一梦毕，天明又各分路出。草间饿骨烂始收，后者招魂前者哭。哭声震天天下闻，可怜白昼无片云。”^{③⑨}嘉庆十九年，刘开在《悲哉甲戌行》中又描写了旱灾中农民的悲惨生活情景：“父老相见但流涕，悲哉今又逢恶岁。昔年疮痍未全复，如何旱魃更为厉？……禾苗枯死衣典尽，十户九户无朝餐。野藕锄罢汗流颊，更剥榆皮作生业。”^{④①}《食蕨叹》也是写旱灾中农村的，其中有句道：“昔闻力田能免饥，今见老农愁不死。出门四望面如灰，十户七闭三半开。亲里相见各无语，但问何处多野菜。”^{④②}

天灾往往和人祸交织在一起，刘开的诗篇不仅描写天灾给农民造成的苦难，也揭露了在天灾之后百姓又遭官府催逼赋税之苦。在《催科吏》中写道：

妇女惊藏老稚走，望见旌旗逃恐后。
借问逃者意云何？官领百人亲催科。追迫株连及比户，小民有口难言苦。非敢避官如避寇，自来畏役胜畏虎。官严役怒势莫

当，生断人命如牛羊。忍将血肉换上考，鞭挞何碍称循良。如此用心尚何极，火煎日夜怜不得。但嗟旧岁禾为尘，人家所余唯一身。今春绝炊已累日，纵有枯髓锻不出。不出岂能使终止，官令如山违必死，明日街头鬻妻子！^⑫

这首诗鞭挞了催科官吏穷凶极恶，如同虎狼，视百姓“人命如牛羊”。喟叹农家在经受灾荒后，“绝炊已累日”，还要完纳官府的科派，“官令如山违必死”，只好被迫在“街头鬻妻

子”。百姓除完纳苛重的赋税，还要为官府服劳役。《力役谣》即描写了服劳役者的悲凄情景：“自嗟充役五十载，饥寒留得只身在。长途奔走无虚日，匆皇宁得顾家室。官钱十枚余在手，归来羞涩未敢出。老妻诟骂不绝辞，囊中米尽儿啼饥。”^⑬百姓们生活饥寒交迫，而官吏们却是骄奢淫逸：“百金之费人所难，此辈掷同瓦砾看。梁肉腐臭浪弃地，路旁见者心为酸。”^⑭《关下曲》揭露的权官的奢靡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方宗诚：《记刘孟涂先生轶事》，《柏堂集·次编》卷9。光绪六年刻本。

姚元之：《刘孟涂传》，《刘孟涂集》卷首。道光六年姚氏槃山草堂刊本。

姚莹：《中复堂全集·东溟文后集》卷10。同治丁卯年安福县署刊本。

刘开：《张阮林传》，《刘孟涂集·文集》卷10。

姚莹：《北园集诗序》，《中复堂全集·东溟外集》卷1。

刘开：《赠吴子方序》，《刘孟涂集·文集》卷6。

陈方海：《刘孟涂传》，《刘孟涂集》卷首。

姚永朴：《旧闻随笔》，第197页。黄山书社1989年版。方宗诚：《刘孟涂先生墓表》，《柏堂集·前编》卷10。光绪六年刻本。

张维屏：《花甲闲谈》卷5。

张维屏：《听松庐诗钞》卷5。

⑪姚元之：《刘孟涂传》，《刘孟涂集》卷首。

⑫方宗诚：《记刘孟涂先生轶事》，《柏堂集·次编》卷9。

⑬管同：《因寄轩文集·二集》卷4

⑭姚元之：《刘孟涂传》，《刘孟涂集》卷首。

⑮卒年据方宗诚《刘孟涂先生墓表》，《柏堂集·前编》卷10，姚元之《刘孟涂传》则记为“闰月十一日”。

⑯刘开：《论语补注自序》，《刘孟涂集·文集》卷7。

⑰刘开：《上汪瑟庵大宗伯书》，《刘孟涂集·文集》卷4。

⑱刘开：《论语补注自序》，《刘孟涂集·文集》卷7。

⑲刘开：《学论》上，《刘孟涂集·文集》卷2。

⑳刘开：《学论》上，《刘孟涂集·文集》卷2。

㉑刘开：《学论》中，《刘孟涂集·文集》卷2。

㉒姚鼐：《复蒋松如书》，《惜抱轩全集·文集》卷6。中国书店1991年版。

㉓刘开：《学论》中，《刘孟涂集·文集》卷2。

㉔刘开：《学论》中，《刘孟涂集·文集》卷2。

㉕刘开：《义理说》，《刘孟涂集·文集》卷1。

㉖刘开：《上汪瑟庵大宗伯书》，《刘孟涂集·文集》卷4。

㉗刘开：《学论》上，《刘孟涂集·文集》卷2。

㉘刘开：《贵齿论》，《刘孟涂集·文集》卷2。

㉙刘开：《沈晓堂七十寿序》，《刘孟涂集·文集》卷6。

㉚《中复堂全集·东溟文集》卷6。

㉛刘开：《复陈编修书》，《刘孟涂集·文集》卷3。

㉜刘开：《初学集序》，《刘孟涂集·文集》卷7。

㉝管同：《因寄轩文集初集》卷5、《二集》卷4。

㉞方宗诚：《刘孟涂先生墓表》，《柏堂集·前编》卷10。

㉟刘开：《刘孟涂集·骈体文》卷2。

㊱陆继辂：《合肥学舍札记》卷5。光绪六年兴国州署重刊本。

㊲姚鼐：《复刘明东书》，《惜抱轩全集·文后集》卷3。

㊳刘开：《上莱阳中丞书》，《刘孟涂集·文集》卷3。

㊴《刘孟涂集·前集》卷2。

㊵《刘孟涂集·后集》卷7。

㊶《刘孟涂集·前集》卷2。

㊷《刘孟涂集·前集》卷2。

㊸《刘孟涂集·前集》卷2。

㊹《刘孟涂集·前集》卷2。